

拿破仑御用珠宝、清朝高定凤冠……300余件中外珍宝汇聚浙博

跨越五个世纪的东西文明对话



葡萄形耳坠。



克雷夫科尔麦穗冠冕。



蜻蜓女神胸针。

■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李恬怡

暑期周末,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的一个展厅外排起了蜿蜒的长队——“绽放——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正在展出,展览荟萃了约300余件/套珠宝,包括国内顶级文博机构的10余件典藏珍品,以及来自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珠宝珍品。它们横跨了五个世纪的珠宝艺术史,钻石的冷冽光芒、翡翠的温润色泽、黄金的永恒质感,是对人最直观的吸收。

在欧洲,很多人十分青睐麦穗图腾制作的珠宝。哪怕是叱咤欧洲的拿破仑,也难逃它们的“捕获”。那时,拿破仑就常委托法国著名的珠宝工匠尼铎制作麦穗珠宝,既用于王室场合,也用于私人赠礼。尼铎是珠宝品牌尚美的创始人,也是拿破仑的御用珠宝匠。

眼下,其中一顶由尼铎制作、拿破仑赠送臣子的钻石麦穗,后经改制成为麦穗冠冕的重磅展品已经来到浙博。跟随策展人常自洁的脚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跨越时空的璀璨对话——每一件珍宝都在诉说着人类对美的永恒追求,以及东西方文明在艺术长河中的相互辉映。

璀璨珍宝
辉映自然之境

穿行于明暗交织的展厅,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珠宝依旧流光溢彩。它们镌刻着时代的美学密码与工艺技术,光影流转间,向我们娓娓道来匠人的细腻与执着。

展览开篇处,一排生动的动植物纹饰珠宝,赋予了这片空间灵动自然之美。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艺术与工艺中的自然趣味泛及中西,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情趣:飞禽走兽、鱼虫花草,或形态逼真、或俏丽娇妍,装点其间,芳菲满目,妙趣横生……这种审美趣味在19世纪初的西方发展至鼎盛。

“我们能看到西方珠宝对自然的模仿充满艺术性,呈现出非常写实的姿态。”常自洁在一处展柜前停下脚步,一枚由黄金、银、钻石构成的雨枝蜂蜜胸针波光粼粼。它由法国珠宝世家、被誉为“王后的珠宝商”的麦兰德家族在1840年打造。

“你看,这枚胸针通过宝石勾勒出植物在雨中的画面,钻石流苏仿佛是落下的水滴垂垂欲坠,在树叶周围还制作了几只蜜蜂,是罕见的有动物造型的‘潘派尔’风格的胸针。”常自洁说。“潘派尔”(法语译为“流苏”或“垂饰”)是一种珠宝设计风格,一系列宝石或钻石以瀑布状排列而成,按大小递减,最终以一个非常小的“冰状柱”吊坠结尾。19世纪,因受当时自然主义影响,“潘派尔”风格珠宝风靡法国。

另一款由尚美第四代掌门人于勒·弗森主导设计的常春藤叶手镯,同样充分诠释了19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精神。手镯将精妙的珐琅绘制与镌刻工艺融为一体,黄金打造出蜿蜒有致的枝干结构,肌镂饰纹覆以绿色珐琅描摹藤叶形态,玫瑰式切割钻石勾勒叶脉,一丝不苟的镶嵌工艺令叶片的脉络纤毫毕现。“再看另一件冬青叶胸针,连叶子的锯齿边和自然卷曲的样子都表现出来,可以说是用坚硬的材质去表达自然的柔软。”常自洁说。

放眼看去,藤蔓间错落点缀白色巴洛克珍珠,与绿色珐琅和璀璨钻石相映生辉,将浪漫诗意娓娓道来。这让我们想起19世纪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的诗句:“宝石张开眼睛,羽翼无声地飞起。”

与西方不同,在珍宝中所体现的

中国的自然主义,则是哲学化的,更加内敛的,注重用自然元素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愿景,这是独特的东方美学范式。

展厅内的中国珍宝多用黄金打造而成,充满了独属中国人的吉祥如意。比如大红大紫的颜色,以及蟒纹的装饰,都是皇族或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的;再如“葫芦”谐音是“福禄”,这是广受民众喜爱的自然吉祥物;许多花卉也充满了象征意义,喜鹊和梅花两个意象组合而成的“喜上眉梢”,自带美好的寓意。

行走间,我们的脚步停在一对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金累丝蜂蝶赶菊花篮簪前。只见巴掌大小的金饰花篮中,开出朵朵灿烂的菊花。花丛中,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篮中还有象征祥瑞的灵芝。由灵芝、菊花、蜂蝶等元素构成的精致花篮造型,饰件全部用金丝掐出,再攒焊成型。

它集累丝、锤揲、錾刻、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工艺复杂却繁而不乱,彰显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独特审美。其中,蝶恋花的互动,在古人心中如同恋人间的缠绵悱恻,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采用这种纹样的金银首饰,也多用于婚礼。它们既凝固了时代风尚,又折射着文明的传承。

奇妙碰撞
融汇中西之韵

300余件珍宝,是一部镌刻在金属与宝石上的人类精神史,也见证了东西方艺术与文化的交流融合。

在西方世界,曾有一段时间掀起一阵“中国热”。这段时期,许多中国文化元素进入西方,引起了西方贵族的强烈兴趣与好奇,他们幻想着东方世界的模样,并在17至19世纪开启了风靡欧洲的“中国风”艺术浪潮。

可以说,随着东方器物与游记文献的西传,瓷器上的缠枝纹样、山水画中的亭台楼阁,逐渐演变为欧洲装饰艺术中独特的视觉语汇。这种糅合东方色彩与构图的美学风格,被巧妙熔铸于西方珠宝与艺术珍玩中。

东方元素,在西方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比如“寿”字在中国有着长寿万福的美好寓意,团寿纹是寿字纹的一种,外部轮廓为圆形,以线条环绕,意为生命绵延长久。展厅里,许多团寿纹装饰在西方珐琅工艺制作的化妆粉盒上,形成一种优雅而奇妙的碰撞。

“中国热”的兴起,让很多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器物到达了西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有了实实在在的载体,当然也打破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

当这些中国制造的器物离开了文化本土,抵达异域,就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简单位移。它们必将在新的文化土壤中,开花结果。

这样的新景观,是一种功能错位,但也可以成为时代符号。常自洁带着我们来到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展品前,那是一个簪子形状的帽针。

20世纪初,欧洲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女性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人剪去长发、脱下束腰,以波波头与流苏裙展示自信之美。

20世纪40年代,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量妇女进入社会工作,流行趋势同样随之改变——曾经,欧洲的女性们出门被要求佩戴宽檐帽,因此需要一个帽针来固定。后来,她们拥有了在公众场合不戴帽子的权利,再加上低顶棚汽车的流行,都让高宽沿的帽子和帽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了“时代的眼泪”。

这枚帽针受到明清女性首饰造型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汲取灵



珍宝艺术展现场,观众对着凤冠等展品拍照。

本报记者 徐文迪 摄



葡萄簇饰品套装前,观众驻足欣赏。



蜂鸟鹭羽胸针。

除署名图片外,本版图片均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

感,做成了簪子形状,但在用途上则服务于西方礼仪,并最终定格在了那个年代。“它好像有了文明的刻度,让我们看到浓缩于百年的女性地位发展史。”常自洁说。

精益求精
镌刻匠心之魂

2023年,常自洁及团队就开始筹备珍宝系列展览,展览走过成都站、长沙站、广州站,最终在这个夏天来到浙江。

在前三站展览中,从国内文博机构借走的文物,周期较短,需要先归还,让它们回家“休息几天”,检验文物状态后再出借。而从境外机构借来的珠宝,在海关的监督下,一般可以拥有相对长的展出周期。常自洁解释,这主要是出于对文物安全的考虑。此外,由于制作工艺不同,国外的珠宝主体多由宝石及贵金属镶嵌锻造而成,抗损性较强。

在浙博展厅中行走,幽暗灯光下,可见远道而来的定州博物馆的鎏金点翠嵌宝龙凤冠。它装点有三龙十八凤,使用掐丝点翠工艺,点翠与原有嵌宝大部分脱落,只剩下堆叠的纤薄金属带来机械美感。尽管如此,这件来自清朝的“高级定制”仍引得众多观众打卡拍照。

继续往前走,是另一种令人赞不绝口的繁复奢华。

尚美巴黎典藏部门总监 Violaine Bigot 也告诉记者,她在展厅里发现,中国珠宝更多是有关黄金,中国古人掌握了锤炼黄金的高超技艺,而法国珠宝的要义则是如何镶嵌,尽力让金属减少,因此更多与石头、珍珠等有关。

在西方珍宝中,珍珠是不可替代的存在。本次展览中,纯珍珠虽不多,但很多展品都少不了以珍珠为点缀。比如,一款由尚美第七代掌门人约瑟夫·尚美于1895年创作,并于1923年改制的垂幔式项链,尽显“美好年代”时期的优雅与精致。它的设计精髓在于绝妙的垂褶效果,钻石镶嵌的垂花饰搭配天然纽扣珍珠与浑圆珍珠点缀,为作品增添灵动光彩。

珍珠与人类结缘的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的珍藏品。早在公元前2000年,波斯湾地区就已开始出产珍珠了,而这些珍珠通过商路流通到欧洲,开启了珍珠在欧洲的传奇之路。

此次展览展出的珍宝,来自浙江省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等国内11个文博机构,以及巴黎尚美等部分境外机构。然而,各色珍宝要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运来,过程极具挑战性。尤其是那些采用点翠工艺制作、流传数百年的中国珠宝,非常易损。“点翠的羽毛如果掉了,就是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要十分小心。”常自洁指着展柜里洗尽铅华的凤冠说。

当我们将目光从具体器物移开,便会发现,眼前是一部用珠宝写就的文明诗篇。“我想这次展览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在今天要以一种尊重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传统方式进行创作,同时仍然向世界其他地方敞开怀抱,打开眼界是多么的重要。”Violaine Bigot 说。

这些来自东西方的珍贵作品是如此不同,却又能在同一片空间和谐存在。它们既是古典理想的载体,也是变迁时代的镜像。

而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在金属与宝石的光芒中,感受到人文精神的流动。恰如展览前言所说,这是一段美的旅程,愿你看见,在时光的熔炉中,有人锻打星辰的碎屑,以金银为诗,以宝石为韵,在颈上镌刻银河的私语,于指间轻触大地结晶。

链接

凤冠的尊荣



凤冠霞帔,历来被视为中国女子最隆重的衣着服饰。

“凤冠”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石季伦)使翔凤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佩;紫金,为凤冠之钗,……铸金钗像凤皇之冠。”在当时,凤冠并没有被纳入皇家的礼制当中,也没有成为后妃的专属,而是一种华丽的装饰品。

到了唐宋时期,冠饰样式日益丰富,如白角冠、团冠、等肩冠等,成为了当时的“时尚单品”。

《宋史·舆服志》记载,北宋后妃在册封、朝谒等重大典礼上,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凤冠。可见,此时凤冠已成为象征后妃尊贵身份的重要标志。

到了明清两代,凤冠的发展进入高峰。各式凤冠用珍珠宝石点缀,工艺精湛,色彩绚丽,尽显雍容华贵。虽然明清凤冠在造型与风格上各有特色,但无一不展现出极高的艺术和审美水平。

本次展陈中,一顶来自内蒙古博物院的鎏金点翠凤冠,吸引了众多游客的脚步。这件凤冠原属于一位清朝公主,它的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都代表着清朝时期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精细编织而成的菱形网格骨架上,饰以十四支铜鎏金点翠细花和九朵镶珍珠牡丹花饰,两侧插凤衔珠步摇,十分精致华美。

它不仅是公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更在此后随公主远嫁到蒙古,见证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鼻烟盒的奥秘



展厅中众多珍宝华丽而耀眼,有件展品极易被忽略,却十分有意思,这就是拿破仑肖像凹雕鼻烟盒。这件长方形鼻烟盒,长约6厘米,宽约4厘米,整体由黄金打造,盒盖上镶嵌有拿破仑头像的凹雕玉髓。

最初,鼻烟盒仅作为一种储存鼻烟的私人配饰而存在,大多由珍珠母贝、动物角或玳瑁壳制成,因为那时有机材料被认为是储存烟草粉最好的材料。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鼻烟盒变成了一种外交礼品,材质多为纯金、玳瑁,其上的装饰物变得奢华繁复,成为拥有者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在政治文化上,鼻烟盒具有特殊意义。绘有统治者肖像的陈设性鼻烟盒,更是昂贵的礼物。拿破仑是鼻烟的重度爱好者,甚至在外交场合赠送带有自己肖像的鼻烟盒作为礼物。鼻烟盒也作为拿破仑帝国与外邦绑定的信物,成为赐予帝国盟友的勋章。

在制造技艺上,拿破仑凹雕鼻烟盒也大有来头。其盒身由英国著名金匠约翰·诺瑟姆制作,他是当时的皇室御用金匠。中间的拿破仑头像,并不是直接照着拿破仑本人雕刻的,是以罗马著名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以拿破仑任第一执政时的大理石头像为原型创作的。凹雕上,还有当时意大利的著名宝石雕刻大师路易吉·皮勒克的签名。

一件小小的鼻烟盒,集结了多位顶级大师的手笔,跨越国界,将艺术匠心与历史风云,都浓缩在这方寸之间。

明末清初,西方吸闻鼻烟的潮流开始传入中国,并借外交的形式进献给当朝皇帝,很快便深受达官显贵所喜爱。此后,鼻烟盒也逐渐融入了东方色彩,有的演变为极富中国特色的东方艺术佳品——鼻烟壶。小小鼻烟盒,搭建起一座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值得观众为它分神片刻。

(本报记者 李娇俨 整理)